



16.97

鲁迅思想作品论稿

赵持平 王吉鹏 著

鲁迅思想作品论稿

Luxun Sixiang Zuopin Lungao

赵持平 王吉鹏著

大连工学院出版社出版 辽宁师范大学书稿编辑室供稿、发行
(大连市甘井子区凌水桥) 抚顺市教育印刷厂印刷

字数：146千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

印数：0001—5150册

1987年2月第一版

1987年2月第一次印刷

责任编辑：文自成 刘宪芹

封面设计：达野 责任校对：苏玉

统一书号：10400·1 ISBN 7—5611—0002—7/1·1

定价：1.25元

鲁迅思想作品论稿

赵持平 王吉鹏 著

52.73/1.7

大连工学院出版社

1987年·大连

目 次

上篇 论鲁迅小说与国民性

“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	(2)
“比沙漠更可怕的人世在这里”	(9)
罗网中的挣扎者	(19)
《阿Q 正传》的主题与阿Q 的奴才性格	(27)
《药》、《祝福》琐谈	(36)
也谈祥林嫂的“反抗”和“斗争”	(43)
“病根何在”？	(52)
读《论鲁迅小说中的人物》	(67)

中篇 论鲁迅思想

国民性问题与思想发展	(73)
爱国主义精神的发展和特点	(92)
对待人道主义的态度的变迁	(103)
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和表现	(114)
对弗洛伊德学说的认识	(128)

下篇 论鲁迅诗及其它

“五四”前夕的几首白话诗·····	(140)
诗歌的爱国主义主题·····	(150)
《爱之神》、《腊叶》新解·····	(157)
读《风筝》·····	(163)
《野草》：中国散文诗的丰碑·····	(168)
《两地书》简论·····	(182)

余论

也谈“画眼睛”·····	(195)
散文《小米的回忆》与鲁迅·····	(198)

附录

在百草园和三味书屋·····	(205)
北京女师大旧址参观记·····	(209)

后记·····	(212)
---------	---------

上 篇

论鲁迅小说与国民性

“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

致力于国民性问题的研究，不断探索改造中国国民性的途径，贯穿于鲁迅的一生。而且也成为他的小说创作（《呐喊》、《彷徨》）的重要主题。鲁迅小说是中国国民性的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我们看到了中国国民性的斑斓陆离的状貌。

“暴露国民的弱点”，鲁迅明白进过，这是《阿Q正传》的写作意图。不仅《阿Q正传》如此，他的其他一些小说对包括精神胜利、麻木、愚昧、驯顺、守旧、卑怯、势利等在内的国民性的痼疾，也无不加以发露和剖析。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在怀着深广的忧愤着重对民族的弱点痛加鞭挞时，也从未忘记从那些“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去寻求民族自救的力量，发掘蕴藏在他们身上的优秀品质，表彰民族坚韧的斗争性格，歌颂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早自青年时代起，胸中就充满爱国激情的鲁迅是看到了这点的。他曾明确地指出：“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华盖集续编·学界的

三魂》)这里的“民魂”，正是指中国国民性的优点，是需要肯定和发扬的宝物。

鲁迅在他的小说里尽管着重批判了国民的劣根性，但他却从未采取全盘否定中国国民性的态度。笔锋所至，不忘肯定和颂扬“民魂”的珍贵。他既喟叹国民劣根性的顽固，又对国民性的改造抱着乐观的信念。他说：“谁也不敢十分决定说：国民性是决不会改变的。在‘不可知’中，虽可有破例——即其情形为从来所未有——的灭亡的恐怖，也可以有破例的复生的希望，这或者可作改革者的一点慰藉吧！”（《华盖集·忽然想到（四）》）正是这种“慰藉”，促使他努力表现国民的优点，坚信“历史是过去的陈迹，国民性可改造于将来，在改革者的眼里，以往和目前的东西是全等于无物的”（《译文序跋集·〈出了象牙之塔〉后记》）。

下面我们就鲁迅前期小说创作（《呐喊》、《彷徨》）的内容，看看鲁迅是如何从事启发蒙昧，肯定“民魂”的工作的。

小说《药》通过茶馆老板华老栓买人血馒头为儿子治病一事，深刻地揭露了专制统治和封建迷信所造成的人民群众的麻木和愚昧。与此同时，作品歌颂了为民族解放不惜捐躯的革命者夏瑜英勇无畏、视死如归的高风亮节。在这个被关在狱里还宣传“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鼓动牢头造反的革命家身上，看不到丝毫的麻木和怯弱，体现了我们民族酷爱自由、反抗压迫的伟大性格。《狂人日记》和《长明灯》里颂扬了敢于反抗吃人者，对数千年的封建统治提出挑战的“狂人”和“疯子”。狂人翻开历史，透过“仁义道德”几个字，终于看清了“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他

明白“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而且针对中国这个“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国度，大胆提出了“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的疑问。“疯子”尽管被关进“粗木直栅”的吉光屯社庙，仍然在高呼“我放火！”“狂人”和“疯子”正是鲁迅后来所称赞的那种“拚命硬干的人”（《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在《故乡》里，作者怜悯闰土的不幸，一方面为他奏出了一支哀乐，另外又为他的勤劳、忠厚奉献上一曲赞歌。《社戏》则满腔热情地赞扬了农民孩子双喜和阿发的天真纯朴以及六一公公的醇厚善良。就在《祝福》中，鲁迅对祥林嫂不甘命运作弄的坚韧性格也是不无褒奖的。尤其是在《一件小事》中，作者刻划了一个普通的人力车夫无私友爱的精神。这个人力车夫敢于负责、乐于助人的优秀品质，使“我”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时隔六年之后，还“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在这个人力车夫身上丝毫也不存在鲁迅常针砭的国民的劣根性，反而闪烁着鲁迅所一直追求的“理想的人性”的光芒。

当然，总的说来，当时鲁迅所注重的还是启发“民魂”的工作，也就是着重于批判国民的弱点。因此，他在谈到国民性的时候，往往是和“改造”一词并提的。或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吧，许多同志认为鲁迅当时看人民群众的消极面未免多了，并归结为是他的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局限。这个结论未必妥当。只要认真研究鲁迅的所有作品和言论，可以发现他的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工作具备下面两个特点：

第一，他鞭笞国民性的痼疾，是与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的任务和目标相一致的。在中国社会发生大动荡、大转变的时刻，鲁迅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国民的弱点和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是格格不入的。尽管当时他还不甚明白这种革命是什么，但他从唤起民众的觉醒出发，着重揭露民族的病态和国民的弱点，既顺应时代的召唤，又符合历史的必然要求。他暴露国民的劣根性，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使人们为自己可鄙的精神状态而痛心疾首，努力摆脱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所造成的精神负累，成为“真的人”。当年，俄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痛感俄罗斯人民命运之痛苦，悲愤地写道：“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列宁并不因此责怪他没有看到俄国人民蕴藏的革命力量，而是说：“大俄罗斯人中的公开的和不公开的奴隶（沙皇君主制度的奴隶）是不喜欢想这些话的。然而我们认为这是真正热爱祖国的话，是感叹大俄罗斯人民群众缺乏革命性而倾吐出来的热爱祖国的话”。（《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因此可以说，鲁迅当时对群众的一些愤激之词是“真正热爱祖国的话”。他对“国民劣根性”的渲染和强调是源于“热爱祖国”这一目的的。

为使启发“民魂”的工作卓有成效，鲁迅十分注意介绍外国的有关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他曾以极大的兴趣翻译了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和《出了象牙之塔》两本书。厨川白村把文艺看作“苦闷的象征”，是“生命力受压抑而产生的苦闷懊恼”。鲁迅向中国读者介绍他的作品及其理论，是为了改变中国人民“萎靡锢蔽”的精神状况。他认为厨川对于“本国的微温、中道、妥协、虚假、小

气、自大、保守等世态，简直可以疑心是说着中国”，可以此为药方，医治“同病的中国”（《译文序跋集·〈出了象牙之塔〉后记》），厨川对本国人的攻击和批评同样可以“切中我们现在大家隐藏着的痼疾”（《译文序跋集·〈出了象牙之塔·从灵向肉和从肉向灵〉译后附记》）。另外，鲁迅对国外资产阶级学者发表的揭露中国国民性的言论和著作也采取了并非一概否定的谨慎态度。一八九六年，日本人翻译的美国传教士斯密斯著的《支那人气质》一书在东京出版。鲁迅联系中国国民性的改造问题，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提到过这本书。直到一九三六年还写道，“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且介亭杂文末编·“立此存照”之三》）“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鲁迅肯定斯密斯这本书的一些积极意义，是因为他觉得对我们自己的一些缺点“无须掩饰了，外国的人知道我们，常比我们自已知道的更清楚”（《华盖集·忽然想到之十一》），此书读后，可以引起我们的深刻反省，有助于振奋民族精神。这和他的利用小说“揭出病苦”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思想是一致的。

第二，他无情地揭露和批判国民的弱点，却随时指示着光明的前途。他慨叹国民劣根性的难以改变，但对民族的未来又满怀希望。那种鄙视人民的老爷作风，那种缺乏民族自信力和自尊心的卑琐心理以及怀疑人类前途的悲观主义是和鲁迅格格不入的。他对黑暗社会的控诉批判愈狠，对民族的病根分析解剖愈深，就愈对祖国的未来抱有坚定的信念，

愈是感觉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他说，“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华盖集续编·记谈话》）这里，鲁迅不仅指出我们这个病态民族的前途是充满希望的，同时期待着人民大众爆发蕴藏已久的力量，战取“光明的将来”。

鲁迅在完成《阿Q正传》几个月之后所写的《热风·无题》里，记叙了他有次到某公司买“黄枚朱古律三文治”糖果的事。当他将买好的糖果装入衣袋的时候，看到公司的伙计用手指罩住了他未买的糖果，这显然是怕他偷窃的。这使他感到了一种侮辱，便说：“不必的，我决不至于多拿一个……”伙计听了这话，并未强辩，只是赶紧掣回手去，显得惭愧了。鲁迅写道，“于是我也惭愧了”。“这种惭愧，往往成为我的怀疑人头上的一滴冷水”，“渐渐觉得我的周围，又远远地包着人类的希望。”这表明，通过事实的教育，在鲁迅的思想深处闪耀着希望的火光。对于那些愚昧的庸众，鲁迅毫不掩饰他的反感，但他又善于发现群众灵魂中的美的东西，发现那还没有完全泯灭的理想人性。他尊重和信任群众，同他们一道解剖着和反省着，去创造一种新的生活。

鲁迅的小说创作正是体现了这种思想。在《阿Q正传》中，他想通过对阿Q这个“沉默的国民的魂灵”的刻画，暴露被禁锢在“古训所筑成的高墙”里的国民的弱点，但同时又满怀信心地希望：“在将来，围在高墙里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集外集·俄文

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为此,鲁迅有意与自己灵魂里的寂寞和悲哀抗争,听从将令,呐喊战斗,“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因此“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呐喊·自序》)在《故乡》的结尾则热情地祝愿水生和宏儿“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并意味深长地写道:“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鼓励人们在没有路的地方开辟出路来,在我们这个病态的民族的历史上开创出充满希望的新时代。

“比沙漠更可怕的人世在这里”

一九二二年，鲁迅曾把当时反动军阀政府盘踞下的北京称为“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的“沙漠”。而且“比沙漠更可怕的人世在这里”。（《热风·为“俄国歌剧团”》）鲁迅意在指出，不仅北京这个“首善之区”如此，当时整个中国都是一片漆黑可怖的荒漠。由于剥削阶级的长期统治和传统思想的毒害，在旧中国这“比沙漠更可怕的人世”，弥漫着愚昧、麻木、冷漠和怯弱。改造这块沙漠，使死寂、冷酷的人世焕发生机，成为包括鲁迅在内的一代启蒙主义思想家十分注重的问题。除杂文外，鲁迅的小说正是他所从事的这项艰苦工作的真实记录，也显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赫赫战绩。

鲁迅谈起自己的小说创作时说过：“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可见，重视思想启蒙，实践文艺改良人生的主张，启迪个人自觉，唤醒民族意识，改造愚弱的国民性，就是鲁迅小说创作的出发点，也是鲁迅小说突出的现实主义特色。

翻阅《呐喊》、《彷徨》，我们接触到的是一个比沙漠

还要恐怖的世界。黑暗、冷冽、死寂的环境，那些“‘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老中国的暗陬的乡村，以及生活在这些暗陬的老中国的儿女们”（茅盾语）的愚弱、麻木，读来令人窒息和战栗。这里世态残酷，人情冷漠，如果说相互隔膜的人们间尚会发生一些关系的话，那不过是互相充当兴灾乐祸或无聊至极的看客而已。在这里，反叛者为了改变现状的一切努力，竟无法引起那些无动于衷的同胞们的理解和共鸣，如同一场暴风雨卷过沙漠，雷霆和雨水被吸入干灼的砂砾，顷刻间踪迹全无。对这些民族的病态和国民性的痼疾，鲁迅自一九一八年创作《狂人日记》起，“一发而不可收”，连续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在旧中国荒漠的土地上，留下了他的呐喊声和荷戟战斗的身影。

鲁迅通过其小说，对旧中国的“比沙漠更可怕的人世”的暴露和批判，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他痛感人们之间的互相隔膜，以厌恶的心情揭露了市侩习气和缺乏同情心的看客的无聊。其次，他从总结革命的教训出发，在歌颂改革者和革命家的同时，又无情地鞭挞了麻木的群众对任何改革的冷漠，甚至敌视的态度。

对于第一点，鲁迅的小说写的很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形成东方专制主义的稳固基础的经济形态，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互不关心。鲁迅小说对此有着形象的体现。小说《祝福》的主人公祥林嫂的遭遇是够悲苦的了：在经历了亡夫失子的不幸后，她不得不再到鲁家帮工。不仅鲁四老爷视她为“败坏风俗”的不祥之物，就是镇上的人，虽说“仍然叫她祥林嫂，但音调和先前很不同；也不和她讲话，但笑容却冷冷的了”。人们不愿意听她诉说那悲惨的故

事，因为“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人们已经不再同情她了，甚至拿她额上的伤痕来开心。在祝福之夜，这个受尽凌辱的劳动妇女终于默默地离开了这个冷酷的世界。

和祥林嫂的命运相似的还有《明天》中的单四嫂子。单四嫂子是个寡妇，“须专靠着自己的一双手纺出棉纱来，养活自己和她三岁的儿子。”当儿子病危，她急需同情和救助的时刻，所得到的只是无赖红鼻子老拱和蓝皮阿五的趁火打劫，以及庸医何小仙的胡言乱语和王九妈老于世故的支吾。后来，她的宝儿死了，那些来帮忙的人不过借此来打发一下无聊的日子，大嚼一通她典衣借款筹办的酒菜而已。这种冷漠、无情的社会压迫得单四嫂子连气也喘不过来了。

鲁迅的小说无情地谴责了这种缺乏同情心和弱肉强食的世风。孔乙己（《孔乙己》）是个常在“旁人的笑声中”苦度光阴的不幸者。他“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阿Q（《阿Q正传》）这位未庄的弱者成了未庄闲人取笑和泄愤的玩物，但他也没有忘记去欺侮比他更弱的小尼姑。为这一“勋业”得了赏识，阿Q“十分得意的笑”，而那些闲人也“九分得意的笑”。七斤（《风波》）因为失去了一条辫子遭到赵七爷的恫吓，全家惶惶然的时候，同村的人非但不同情，反而“对于七斤的犯法，也觉得有些畅快”。……这都是畸形社会的病态景象。

充当无聊的看客，是旧中国人情冷酷的突出表现。对此，鲁迅小说也多加伐挞。在《呐喊·自序》里，鲁迅叙述了他在日本留学时弃医从文的经过。电影上，一个中国人要被砍头示众了，而四周围着“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竟也

是一些中国人。这对鲁迅的刺激太大了，许多年后都使他不能忘却。我们在他后来创作的《呐喊》、《彷徨》中，还随时可以体会到他对那些“鬼也似的”看客的鄙视、愤慨和批判。

《示众》是篇速写式的小说。它记录了北京一条马路上发生的欣赏“示众的盛举”的情景。一个巡警牵着一个被捆绑着的男人来到街头示众，“刹时间，也就围满了大半圈子的看客”。这些看客中，有秃头的老头子，卖包子的小孩，胖大汉，抱孩子的老妈子，小学生，工人似的粗人，长子，瘦子，猫脸的人，车夫等，都是一些社会上的普通人。为了“赏鉴这示众的盛举”，他们有的“竭力伸长了脖子”，有的“连嘴都张的很大，象一条死鲈鱼”，他们什么也不问，压根也不想知道这罩着白背心的被示众的男人究竟犯了什么法，只是拥挤着“赏识白背心的脸”，看他草帽檐下的“半个鼻子，一张嘴，尖下巴”。一个工人似的人想探个究竟，刚问了一句，便招来了别的看客的不满，迫使他 from 看客圈里溜走完事。后来，把这些看客吸引开去的是别处几个人同声叫好的喝采。原来那边有一个洋车夫不慎摔倒了。这边的“圆阵立刻散开，都错错落落地走过去”，看另一场好戏。这些社会众生相的精神状态是多么麻木和冷酷啊！

在鲁迅的其他小说里，也有类似《示众》的情景的描写。《药》里的夏瑜被杀害的那天，那些赶去赏鉴行刑的人，“很象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他们“鬼似的在那里徘徊”，又“潮一般向前赶”。在行刑地，他们围成了一个半圆，“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提住了的，向上提着”。《阿Q正传》